

誰把詩壇樹「亞洲」

——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壇銜接視野下的邵毓麟、彭國棟與李瑄根*

魏亦均

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戰前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戰後卻分別走向「光復」與「獨立」的歷史進程。對此，本文擬分別就中華民國首任駐韓大使邵毓麟之傳記《使韓回憶錄》，以及宣揚東方文化以成反共大業的《亞洲詩壇》為考察的節點，依序就政治、文學兩條軌跡，勾勒戰後台灣、韓國漢詩人的人際網絡，以折射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壇的交流生態。藉此揭橥在此看似毫不相干的戰後歷程中，台灣、韓國漢文學間，實蘊藏著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與互動機制。具體而言，台灣在「光復」的語境下，帶有強烈象徵民族精神的漢詩，被大力提倡用以重構國族認同；反觀過去同為東亞漢字文化圈一員的韓國，在獨立的自覺與政治需求下，則走上倡議廢止漢字以推行國語的發展路線。將台灣以漢文學建構民族性，韓國以去漢化的方式來凝聚韓國魂的政治實踐並置而論，兩國文學發展看似背道而馳，但實則就在兩造一邊擁護漢詩與一邊壓抑漢字，不斷相互作用的動態張力中，意外開創台灣、韓國漢文學錯置的生產與傳播空間，繼而締造台灣、韓國文學史上互動最為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漢字文化圈戰後的「光復」與「獨立」：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壇的轉向與交錯〉為題，宣讀於「後殖民與去帝國：戰後韓國、台灣的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韓國東國大學國語國文文藝創作系鄭煥局教授（동국대학교 국어국문 문예창작학부 정한국 교수）等與會師長，以及投稿期間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此外，韓國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梁承睦專任研究員（동국대학교 한국문학연구소 전임연구원 양승목 연구원）、韓國東國大學國語國文韓國古典文學系博士候選人劉洋（동국대학교 국어국문 한국고전문학학과 박사수료 유양），概允協助相關文獻資料的查找與取得，俾使本文更臻完整，在此一併謹申謝忱。

密切的一段特殊景觀。同時也欲指出藉漢詩重構戰後台灣、韓國文學互動機制，以突破目前既有之研究框架與範疇的可行路徑。

關鍵詞：戰後（1945）、漢詩、邵毓麟、彭國棟、李瑄根、《使韓回憶錄》、《亞洲詩壇》



Who Founded the Chinese Poetry Communities in “Asia”:

Explor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ost-war Chinese
Poetry Communiti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hao Yulin, Peng Guodong, and Lee Seon Geun

Wei Yi-Chun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Both Japanese colonies befor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ach moved toward retrocession and independence after the war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compares two works: *My Mission to Korea: A Personal Record of Modern Sino-Korean Relations* and *Asian Poetry*. The former is the biography of Shao Yulin, the first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South Korea; the latter is a magazine founded by Peng Guodong, which advocated anticommunism and promoted Eastern cult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 of Chinese poe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to reflect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ost-war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poetry communities. This analysis reveals the intertwined historical origin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s of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had previously seemed to be unrelated.

Taiwan, under the context of retrocession, favored Chinese poetry that embodied patriotism; in contrast, South Korea, which was once a member of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sphere, largely ceased its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developed its own language system to fulfill political needs and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independence. Whereas Taiwan established nationality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uth Korea gathered the consensus of its people through de-Sinicization.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former colonies appeared to diverge; the former preserved Chinese poetry, whereas the latter suppressed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dynamic tension generated by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poetry of Taiwan and South Korea unintentionally created a space for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literature. Thus, the use of Chinese poetry to reconstruc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ost-war Taiwanese and South Korean literature offers potential breakthroughs in relation to existing frameworks and scopes of research in both literary domains.

Keywords: Post-war, Chinese Poetry, Shao Yulin, Peng Guodong, Lee Seon Geun, *My Mission to Korea: A Personal Record of Modern Sino-Korean Relations*, *Asian Poetry*



誰把詩壇樹「亞洲」

——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壇銜接視野下的邵毓麟、彭國棟與李瑄根

一、前言：「同文」以反共機制下的《亞洲詩壇》

戰後的亞洲還有漢詩活動的空間與必要嗎？又是「誰把詩壇樹亞洲」？¹1895年日本對台灣展開殖民統治，至1945年台灣被中華民國「光復」的50年間，亞洲各國間的主從關係、權力秩序與互動機制也隨之產生結構性的變革，而1910年日本強占朝鮮為殖民地則是另一關鍵性地轉折。日本把持朝鮮後，迫使大批主張韓國獨立建國的朝鮮知識分子先後轉進中國，這批文化人不僅介入並改變亞洲文壇的秩序，也讓戰前韓國獨立運動與戰後大韓民國的獨立與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產生千絲萬縷的關聯性。²另一方面，向來沒有明確民間交流與政經濟往來的台灣與朝鮮，也因戰前同屬日本殖民地，及戰後被中華民國政府以不同的形式接收與扶植的背景，產生新的政經互動與歷史疊影。那麼，從殖民到光復／獨立的進程中，分別成為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的台灣與朝鮮，在一連串後殖民的歷程中，兩造的關係究竟是如何被描繪與建構？而文學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又發揮著怎樣的效益？

確實，誠如崔末順所言，「由於台灣與韓國共同經歷過被殖民以及戰後冷戰體制的歷史經驗，兩國的知識界普遍認為有必要相互了解反映此一經驗的文

1 錢公來，〈亞洲詩壇創刊〉，《亞洲詩壇》1卷2期（1959.04），頁23。

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09）。金秉祚，《獨立運動史略》（韓國서울特別市：亞細亞文化社，1974.10）。另，筆者在拙文〈從「華夷之爭」到「和漢變態」下的東亞景觀：以柳麟錫《毅菴集》為觀察場域〉中，亦曾對此進行討論。詳參魏亦均，〈從「華夷之爭」到「和漢變態」下的東亞景觀：以柳麟錫《毅菴集》為觀察場域〉，「17世紀到20世紀初的東亞交流和區域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17.07.11-12）。

學」。³然而，由於戰後台灣／中華民國、韓國斷交等因素，相關研究一直要到2000年後，才相對穩定且有系統地被引起關注與論辯。⁴對此，歷來論者則多著眼戰前被壓抑或「弱小民族」的台灣與朝鮮，⁵在迎拒現代性的脈絡下，如何共構殖民與抵抗文學的論述，⁶及其戰後又要怎樣解殖民與去帝國等討論，⁷又由於戰後還涉及世界冷戰體系的結構性問題，而當時台灣、韓國又被視為反共前沿的防線，因此在國民黨政府退踞台灣、南北韓對峙分斷的態勢下，反共、⁸冷戰、⁹左翼乃至於分裂／分斷¹⁰等氛圍與條件，¹¹如何影響台灣、韓國各自與彼此的文學生態、交流網絡，¹²也為學界多所關注。大抵，台灣、韓國透過文學所展開的「相互了解」，已取得一定程度的階段性成果，同時也帶出了使兩造在理解對方文學歷史的過程中，重思自身文學成就及其在亞洲文學史上的價值等積極意義。

-
- 3 崔末順，〈韓國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李瑞騰總編輯，〈2013 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12），頁 139。
 - 4 林大根、陳國偉主編，〈台灣文學研究在韓國：歷史情感與東亞連帶〉（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18.03），頁 18。
 - 5 金良守，〈韓台小說裡的殖民地經驗比較〉，「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6.05.27-28）。金尚浩，〈楊達與張赫宙普羅小說之比較研究——以〈送報伙〉與〈餓鬼道〉為例〉，「楊達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2000.04.19-20）。
 - 6 如崔末順，〈台灣與韓國文學的現代經驗〉，《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09），頁 8-16。金良守，〈日帝時代 韓國와 臺灣 作家的 二重言語文學〉，《중국어문논총》23 期（2002.04），頁 368-381。
 - 7 如金良守，〈台灣和韓國小說中對「光復」的記憶〉，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05），頁 135-154。
 - 8 如崔末順，〈反共文學的古典詮釋：五〇年代台灣文藝雜誌所反映的民族主義文藝論〉，《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3 期（2016.12），頁 138-169。
 - 9 如金尚浩，〈論韓國與台灣冷戰時期文學之比較研究〉，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頁 189-212。
 - 10 相關討論可參見白樂晴等著，白永瑞等編，〈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11）。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03）。
 - 11 如金良守，〈戰後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以陳映真為個案〉，《國際中國學研究》6 期（2003.06），頁 309-321。
 - 12 關於台灣、韓國文學交流、比較學術史，可參考崔末順，〈韓國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李瑞騰總編輯，〈2013 台灣文學年鑑〉，頁 139-144。林大根，〈台灣文學在韓國：確立主體位置與超越台灣內部矛盾的可能性〉，林大根、陳國偉主編，〈台灣文學研究在韓國：歷史情感與東亞連帶〉，頁 15-53。

但顯而易見的是，在論者幾乎多以新／現代文學來說明或凸顯，兩國在肆應戰前殖民與戰後去殖民所帶來的衝擊與反擊論述的取徑下，判斷、闡釋或建構台灣、韓國文學互動機制與意義的話，恐怕仍有遮蔽之虞。例如，透過《朝鮮王朝實錄》中的紀錄來看，1670年前後便已能看見與台灣有關的條目，與可能的交涉軌跡。¹³此外，韓國歷代漢詩文集中，其實也不乏有關台灣的記述。¹⁴換言之，從朝鮮因漂流人而使知「大樊」（台灣）是中國明朝正朔最後的根據地而開始注意台灣，¹⁵到台灣清領時期原住民被「邀請」至清國賀壽朝觀時與朝鮮燕行使者的偶遇，¹⁶或日治時期韓國漢儒朴潤元、¹⁷朴榮喆與台灣漢文人的交流，乃至戰後韓國漢學家李家源訪學台灣等歷史淵源、文學書寫與生產活動看來，漢文學實是梳理與評估台灣、韓國兩國文學交流與跨境意義的重要關鍵之一。

那麼，漢詩／漢學究竟是如何觸發台灣、韓國戰後跨境的流動與建構？目前學界針對戰後台灣、韓國漢詩的交流或比較的研究可說是付之闕如，惟李知灝雖同樣注意到《亞洲詩壇》的重要性，然其所關注的面向較聚焦在《亞洲詩壇》如何再現戰後漢詩社群繁複且重層的跨國性，¹⁸與本文欲透過《亞洲詩壇》輻射與輻輳戰後台灣、韓國漢詩文交流網絡的論述目的大不相同。而台灣戰後古典文學相關的研究成果，整體而言，則多關注戰後古典詩人、詩話與詩學的發展，以

-
- 13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卷十八》（韓國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10），頁29。相關討論可參見筆者：魏亦均，〈從「兩島」到「天下」：明鄭／文學視野下台灣、朝鮮的人際與文際關係〉，「東亞細亞學的現代意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韓國嶺南大學主辦，2019.08.12-13）。
 - 14 許怡齡，〈17-18世紀朝鮮漢文集中裡的台灣論述〉，「第三屆西太平洋韓語教育與韓國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韓國學研究中心主辦，2014.06.22-24），頁43-52。
 - 15 魏亦均，〈從「兩島」到「天下」：明鄭／文學視野下台灣、朝鮮的人際與文際關係〉，「東亞細亞學的現代意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韓國嶺南大學主辦，2019.08.12-13）。
 - 16 劉耀、陳文新，〈朝鮮使者筆下的台灣原住民賀壽朝觀活動述略〉，《東疆學刊》4期（2016.10），頁7-12。
 - 17 施懿琳，〈台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台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樸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2001.12.08-09），頁1-24。
 - 18 李知灝，〈戰後初期台日韓漢詩交流：以《亞洲詩壇》在台發刊時期為研究中心〉，「第五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創意應用研究所、國際文化創藝整合發展研究中心主辦，2019.11.22-23）。

及漢詩文在本土與省外文人之間的齟齬、斡旋與協商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議題。¹⁹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黃美娥屢從新／舊文學互動與典範遞嬗的觀點，翻轉戰後／初期台灣與中國新、舊文學角力的動態關係，繼而藉「關係論」的提出，將論述視野從台灣向外衍伸到台灣以外的華人及其詩文表現，其中以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地的漢詩傳播與演繹等議題也陸續受論者青睞，²⁰但學界對於台灣、韓國漢文學的關注卻還是十分有限，如此一來，勾勒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如何產生交錯又是怎樣展開回環往復的互動等工作，便顯得格外急迫與重要。對此，曾系統性地將韓國漢儒引介進到戰後台灣的《亞洲詩壇》，以及戰後中華民國第一任駐韓大使邵毓麟之《使韓回憶錄》，無疑提供我們絕佳的發問起點與考察路徑：戰後韓國文學為何、如何以漢詩的「形式」進入台灣？

1959年，時值反共文藝大行其道的年代，彭國棟在台灣設立亞洲詩壇社，同年發行機關刊物《亞洲詩壇》。²¹彭國棟在〈發刊辭〉中揭示，願同樣使用漢字，或擁有漢字文化傳統的「同文」國家，能以「詩為心聲」來「同宣聲教」，繼而「促進種族之團結」，同聲抵禦「赤禍橫流」，共創「同文之盛事」以「發展東方之文化」。²²然而，《亞洲詩壇》或因經費、或囿於稿源來自亞洲／世界各國而不易取得等因素，故不僅發刊的情況並不穩定外，期間也曾一度停刊，直至1963年9月才由社長彭國棟於香港復刊。對於《亞洲詩壇》的創辦與刊行，彭國棟表示希望《亞洲詩壇》能成為「亞洲各地詩人之大聯盟」，繼而發揮「溝通情感，宏揚詩教，以發展東方文化」的任務。²³由於彭國棟企圖以《亞洲詩壇》

19 如李知灝，〈戰後台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顧敏耀，〈台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姚蔓嬪，〈戰後台灣古典詩發展考述〉（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3）。梁鈞筌，〈「中華共同體」的想像與跨國形構——以《中華詩苑》（1955-1967）為觀察對象〉（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

20 李知灝，〈戰後星馬地區漢詩人在台發表與社群交流：以《中華詩（藝）苑》（1955-1967）為研究中心〉，《台灣文學學報》31期（2017.12），頁63-98。

21 本報訊，〈亞洲詩壇元旦誕生〉，《中央日報》，1958.12.31，5版。

22 前引文皆出自彭國棟，〈發刊辭〉，《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1。

23 〈亞洲詩壇要旨〉，《亞洲詩壇》1卷1期，頁3。

作為串連戰後各國漢儒的交流平台，於是歷來論者對於《亞洲詩壇》的討論或評價，也多聚焦於其如何在「亞洲」的視野下，實踐「詩教之傳播」的功能與效益。²⁴但到底是在怎樣的契機之下，主事者在創刊號中卻唯獨辟引韓國戰前臨時政府總理申奎植《韓國魂》與時任南韓大總領的李承晚的漢詩？再者，《亞洲詩壇》中韓國詩人吳養〈寄呈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有序〉、崔燦翊〈憶澹園斯文〉與金春東〈送郁文大仁還台灣〉等，為數不少的有關韓國詩人記述、感念或懷想與《亞洲詩壇》社長彭國棟間酬唱、問學與吟往等詩文又是如何而來？另一方面，為何越南孔學會唯獨「獻詩」給韓國總統李承晚？²⁵對於上述往往被論者將之與其他亞洲各國詩人、詩文「一視同仁」的現象，其實恰恰揭露著在《亞洲詩壇》中的亞洲諸國並非平起平坐，而是各國間有著疏密不一的網絡與權力關係，進而影響其在《亞洲詩壇》的份量及輕重的結構，而韓國便是其中一個影響整體秩序的板塊。也就是說，韓國及其詩人、詩文在《亞洲詩壇》的特殊的位置意義，並非是用「顯見詩教之傳播，以明詩學之正統」所能承受概括。²⁶那麼，韓國在《亞洲詩壇》究竟又如何異軍突起？而在《亞洲詩壇》輻輳中，台灣／中華民國、韓國密切的交涉與迴響，又是否能提供我們另一種描繪或研究戰後台灣古典文學自身，及其與東亞／世界漢文學互動的進路？

總之，戰後台灣、韓國漢詩／人之所以能展開交流，除了得力於同文的文學脈絡與反共的政治立場外，戰前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比肩作戰的革命情感，更是造就戰後台、韓漢詩壇戰後的銜接不可或缺的動力之一。是以，下文將從中華民國第一任駐韓大使邵毓麟談起，透過從外交到文學脈絡，說明戰後韓國漢詩／人「究竟」且「如何」躍上台灣詩壇或《亞洲詩壇》的外緣背景與淵源。再將視角聚焦在彭國棟、李瑄根²⁷間的互動，說明《亞洲詩壇》創刊的真正成因

24 姚蔓嬪，〈戰後台灣古典詩發展考述〉，不記頁次。

25 越南孔學會，〈呈獻李承晚總統〉，《亞洲詩壇》1卷1期，頁17。

26 姚蔓嬪，〈戰後台灣古典詩發展考述〉，不記頁次。

27 李瑄根（이선근）1905年生於全州，卒於1983年，葬於國立首爾顯忠院。李瑄根曾於1919年曾參與三一

與背景，以確立韓國在《亞洲詩壇》中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最後，則是在前述理解下，指出以彭國棟為首或起點的戰後台灣、韓國漢詩交流的機制及其文學史意義，希望能藉此為台灣與韓國文學研究另闢蹊徑。

二、戰後台灣、韓國後殖民政治與漢詩壇的消長：邵毓麟駐韓歷程與韓國漢文廢止論的交錯

台灣、韓國戰後漢詩的交流，究竟是自然而然？還是政治使然？吳養在〈寄呈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有序〉的詩序中，²⁸ 清楚交代自身因曾在金九左右之故，而與蔣中正等中國官員、詩人有過幾面之緣或往來。從戰前到戰後吳養時時念及過往，有意贈詩，然而，戰爭結束後，人事變動急遽，又面臨中華民國撤退台灣的窘境，因此一直沒有管道可以與「中國」詩人往來互動，也就更別說贈詩給蔣中正。由此可見，韓國、「中國」（中華民國）詩人雖有過淵源，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詩人的交往、詩歌的酬唱便能理所當然、自然而然且暢通無阻地產生跨國的連結，顯然地，《亞洲詩壇》扮演著觸發並銜接台灣、韓國戰後漢詩／人互動的節點。但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為何需要《亞洲詩壇》？意即，台灣、韓國是在什麼樣的現實需求下，必須以漢字／漢詩作為聯繫與溝通彼此之工具或橋樑？

對此，我們必須先回到台灣、韓國在戰後或反共的體制之下，是怎麼被聯繫起「風雨同舟」情感結構的問題。²⁹ 一如前文反覆提及，戰後台灣、韓國在「光

獨立運動，後遭追捕求以極刑。另於 1923 年考取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曾任職朝鮮日報社。後曾加入滿洲國協和會（협화회），並於 1942 年赴滿洲省常縣出任大東農士學校校長一職，1945 年被薦舉為建國預備委員後回國。1947 年到 1978 年間，曾任首爾大學法學院院長、文教部長、成均館、慶熙、嶺南、東國等多所大學校長，以及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等重要職務。對韓國近代史與教育發展，有著舉足輕重且深遠的影響。上述資訊整理自 한국민족문화대백과사전편찬부（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編纂部），〈한국민족문화대백과사전：이선근〉（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李瑄根）（來源：<http://encykorea.aks.ac.kr/Contents/Item/E0044685>，檢索日期：2022.01.14）。

28 吳養，〈寄呈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有序〉，《亞洲詩壇》1 卷 1 期，頁 9。

29 金弘一，〈序〉，彭國棟著，《中韓詩史》（台北：正中書局，1957.04），不記頁次。

復」或「獨立」的基礎上，各自展開廓清歷史與建構認同的工作。但有意思的是，在看似截然不同的政治選擇或處境背後，國民黨政府皆扮演著掌控與介入的關鍵角色。追本溯源，國民黨政府早在戰前時期，便從旁協助、扶植以中國為根據地，並依附於國民黨政權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勢力與獨立工作。³⁰是以，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外，另一方面則是延續戰前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金援、軍事的資助，並以外交手段直接地承認「大韓民國」的獨立，同時也以此鞏固自身退踞台灣後的政治勢力。³¹對於這段台灣、韓國之間由國民黨政府所串連起來的光復／獨立歷史或記憶，學界多著重於兩國在社經、軍政與外交間的交鋒，如何促成日後韓戰的爆發，³²以及國民黨如何「運用朝鮮議題作為服務其自身利益與目標的重要工作」等議題，³³卻忽略戰後國民黨政府之所以達成「在南朝鮮積極培養親華分子、掌握中國東北、華中與台灣等地區三百萬韓僑，作為日後中國對韓外交之資本」的實踐背後，³⁴「詩歌可以增進兩國情感」在外交政治上所發揮的效益。³⁵也幾乎沒有論者，注意到此時正是戰後台灣、韓國文學交錯的節點，與亞洲文學秩序（或漢字文化圈）重構的關鍵。換言之，若要對戰後台灣、韓國文學交流機制有根本性的理解，我們不能忽略外交結盟對文學思想與生產的影響。而將自身參與戰前韓國獨立運動與戰後出使韓國經驗寫成《使韓回憶錄》的外交官邵毓麟，以及創辦《亞洲詩壇》的彭國棟與時任韓國成均館大學校長的李瑄根，便在此歷史脈絡下接棒承擔著銜接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壇的中介與關節。

30 沐濤、孫志科，《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1）。石源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駐華代表團研究》（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05）。

31 「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呈主席蔣中正為外交部呈來韓國新進黨代表金明濬籲請韓旋重開美蘇會議促成韓國獨立及李承晚經歷等文件」（1947.03.20），〈國際政治運動〉，《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60100-00001-017。

32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06）。

33 同註 32，頁 74。

34 同註 32，頁 64。

35 彭國棟，《中韓詩史》，頁 191。

首先，《使韓回憶錄》是戰前「以中國人和中國國民黨員而被韓國臨時政府聘為顧問」第一人與最後一人，³⁶同時也是戰後中華民國首任駐韓大使邵毓麟（1909-1984）的回憶錄，內容主要著重於其參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大韓民國獨立運動以及戰後出任駐韓大使的個人與所見所聞。³⁷細究在中、韓關係史上扮演著穿針引線要角的邵毓麟，其出身中國浙江，早年留學日本，先後在九州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接受法學教育，而邵毓麟也是在日本留學時期與分別來自台灣、韓國的「弱小同胞」展開交往：

我和韓國朋友的交往，始自留學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時期。當時來自韓國和台灣同學們，與我這個中國大陸的學生，常相交往，自然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下的弱小民族。韓國已亡國，台灣早被割讓，而我們中國人，亦祇是待宰的羔羊，命運相差無幾。在同窗的情誼上，再加上一層同病相憐，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識。（《使韓回憶錄》，頁1）

邵毓麟留日的背景，及其在日本所遭遇的國族困境與壓迫，讓他萌生「我想幹我們戰勝國中華民國的首任駐日本大使」，希望藉此翻轉從屬關係的念頭（《使韓回憶錄》，頁4）。然而，時任《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卻以為幫助韓國獨立，並「去做中華民國首任駐韓國獨立國的大使」才能算是真正的勝利，隨後更將曾任韓國臨時政府總理的申奎植的詩文集《韓國魂》轉交給他，鼓勵邵毓麟的擔負起由中國扶持韓國獨立的「擔子」（《使韓回憶錄》，頁6）。而當時只是在四川大學法學院經濟系任教的邵毓麟，因緣際會下，結識同樣在四川大學文學院英國文學系任教的金奎植（《使韓回憶錄》，頁2）。金奎植是韓國三一革命與大韓

36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01），頁49。以下徵引此書者，皆於引文後標示書名及頁碼。

37 《使韓回憶錄》原先連載於《傳記文學》。其後，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河正玉，以此為據翻譯成韓文，並連載於《政經研究月刊》。藉此我們可以推斷，邵毓麟在兩國皆有相當的重要性。

民國臨時政府、韓國獨立運動領袖之一，故邵毓麟在其引介下開始與李承晚、柳東悅、元世勳、田景武與金弘一等韓國革命獨立領袖展開交往，繼而投身「援朝」的工作。將韓國獨立運動視為「爾後終身的事業」的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4），一直要到抗戰爆發以後的1939年，當時還是委員長的蔣中正將其由外交部調派為委員長侍從室秘書後，「援朝」的工作才正式展開（《使韓回憶錄》，頁41）。在此期間，邵毓麟一方面接受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的訓練（《使韓回憶錄》，頁47），同時也透過自身的外交長才，與李承晚、金九、閔石麟與濮精一等主導大韓民國獨立運動的領袖接觸。邵毓麟被蔣中正重用，及其積極為韓國獨立奔走，又獻策以為三民主義能為朝鮮開創新局的建議，深獲時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的賞識，遂於1944年遴聘邵毓麟為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顧問。

時局接著轉到戰後，就在舉國歡騰抗日成功時，蔣中正正在向全國所發出的文告中指示，若不能「收復我們台灣和澎湖的失土」與「恢復高麗的獨立自由」，則「國家的獨立自由就無從恢復，而抗戰的目的亦無由達成」，³⁸而邵毓麟留日的背景，與身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顧問的身分，讓他獲得國民黨政府的倚重，任命其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韓聯絡員」，指派庇護「韓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暨過該政府人員」返韓，³⁹同時也「應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之邀，由滬同飛台北，參加受降典禮，並策劃治台方針」（《使韓回憶錄》，頁70）。在參與接收台灣的工作而短暫停留後，邵毓麟隨後在1949年7月25日從台灣飛往韓國赴任駐韓大使的工作。有意思的是，「未學過作詩，也為從作過詩」的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108），在飛往韓國漢城（今首爾）的飛機上，寫下「生平唯一的打油詩稿」：

38 「蔣中正電魏道明請杜魯門明示美對朝鮮政策並告我仍持原商定主張」，〈籌筆——抗戰時期（五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10300-00057-026。

39 「金九電蔣中正感謝中國相助返國並請邵毓麟同行」，〈革命文獻——蔣總統訪韓〉，《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34-085。

一機凌空起，孤雲挾雨飛，中原赤焰舞，三韓綸音宣；
詔使從天降，禍福應同當，百年敦邦交，忠精在日邊。（《使韓回憶錄》，
頁 108）

邵毓麟趁此「藉詩抒情」（《使韓回憶錄》，頁 108），有感自身幾經波折，但終究是沒有辜負當初與張季鸞對他的交代，以及自己當年立下的「援朝」的心願。但萬萬沒想到的是，如今韓國既已獨立，但卻「中原赤焰舞」，且國民黨政府不敵共產黨的圍剿而節節敗退，不僅丟失中原故土，就連代表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也岌岌可危，而如今能彼此倚靠、扶持的只有患難與共、福禍同當的韓國。但何以不會韓文的邵毓麟能承擔駐韓大使的重責大任？事實上，不論是在戰前還是戰後，邵毓麟都是在「不通韓語」的語境下（《使韓回憶錄》，頁 8），與金九或「擅長漢文」（《使韓回憶錄》，頁 115）的李承晚以「談話有時用中國話或漢文筆談」的手段展開會談、外交等實務（《使韓回憶錄》，頁 8）。在藉漢文／筆談跨越語言隔閡的問題後，邵毓麟之所以能參與台灣的接收與扶持韓國獨立的工作，除了國民黨政府仰賴其過去與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間的淵源，及其留日的背景與能力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歸咎於，其意識到「在華韓人」與「在韓華人」是日後中國（中華民國）能否順利取得亞洲局勢主導權的關鍵之一。也因此，邵毓麟不僅在擬定治台方針時，主張將在台日僑、韓僑問題納入治台政策外（《使韓回憶錄》，頁 70），其就任駐韓大使後，也積極在韓推動僑務政策，為戰後台灣、韓國文學的互動與銜接埋下伏筆。

駐韓期間，邵毓麟以「管教養衛」的理念在韓推行僑務，主張以此「發展成一套華僑組織與華僑自治」的秩序與規範（《使韓回憶錄》，頁 127），再者則有意藉「黨務與僑務的配合」，將三民主義、民主自治的精神，深植於戰後的韓國社會與歷史文化，以鞏固「百年敦邦交，忠精在日邊」的歷史情感與政治需求。邵毓麟為了有效推行此治理方針，便以大使館的名義，出資協助當地的華僑組織創辦《中華日報》，試圖以此鋪陳、培植與發揮中華民國的勢力（《使韓回憶

錄》，頁 128）。但就在邵毓麟積極透過僑務、華僑與《中華日報》等方式拓展中華民國與文化影響力的同時，李承晚政府卻打出「廢止漢字」的政策，⁴⁰並透過各種法條的設立，限縮漢文的使用率與正當性，以重建「國語」的合法性與主體性。⁴¹檢視邵毓麟從僑務、《中華日報》推廣中華民國與中華文化，與李承晚去漢化的政策路線間的矛盾，我們已能從中窺知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扶持而獨立的大韓民國，在逐步重建民族文化記憶以廓清殖民歷史的同時，也漸次表露出擺脫從屬於中華文化或漢字文化圈的欲望，而這也讓「百年敦邦交」的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情感與政治產生齟齬與分歧。對於李承晚「通令全國禁用漢字」的主張與作為，⁴²邵毓麟悻悻然地表示，其「無非是欲不問敵友，藉以排除中日兩國對韓影響。其實禁用敵人的日文，情尚可原，禁用友邦的漢文，自難理解」，甚至是語帶調侃地說，「李大統領本人，漢學修養甚高，既長詩詞，又擅書法，我相信他必有一日會覺悟此舉之非」（《使韓回憶錄》，頁 135）。誠然，不論是李承晚倡議廢止漢字背後政治脈絡、利益考量、個人立場，或彼時韓國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反應，都有著十分龐雜而難解的社會脈絡與情感意志，但通過邵毓麟激烈的反應，甚而直言韓國「不問敵友」的回擊來看，倡議廢止漢字主張的提出，雖未必能真正徹底實踐，但在當時卻仍引起相當程度的衝擊。是以，通過邵毓麟以為韓國藉廢除日文之事趁勢主張箝制漢字的憤慨與費解，除了能因此感受到兩造情感與關係已然發生微妙的變化外，這同時也預示韓國與亞洲文化／文學知識結構的變化，以及，中國乃至於「文化中國」影響力的被去除與削弱。那麼，此時「中國」（中華民國／台灣）與韓國之間的文學交流，是否也因此受到阻礙、箝制而衰退？

整體而言並不盡然。紬繹邵毓麟對李承晚的喊話，我們能知在此之前漢文化

40 不著撰人，〈社說：漢字使用制限하리〉，《東亞日報》，1948.10.03，1版。相關討論亦可參見俞昌均編，《國語의醇化와教育》（韓國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79.10）。

41 金英今，〈第二編：韓國近代轉型期文學〉，金英今編著，《精編韓國文學史》（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07），頁 85-170。

42 不著撰人，〈社說：漢字使用制限하리〉，《東亞日報》，1版。

已深入韓國各階層之日常與知識體系，因此可以想見的是，當時韓國社會中必然存在著與李承晚有著相同背景，即接受與深受漢學影響，甚或是有過中國經驗的知識分子與世代存在。這群對漢學或「中國」有著根深蒂固地情感與信仰的文化人，在面對國內高呼「廢止漢字」以建構民族主體性的尷尬處境，或因此可能逐漸喪失發言權與領導文壇地位時，並非就此消聲匿跡，反而積極向外尋求資源以另闢新徑。

而當時由於漢詩被賦予「宏揚民族德藝，昌大中華詩教育」之任務，⁴³ 而促使「在日治晚期似已瀕臨枯竭的古典詩，遂在此時有了復甦的傾向」的台灣，⁴⁴ 即國民黨政府力主透過漢詩／漢學召喚、穩固以重建民族性，使得相關活動與發表場域日益蓬勃的環境，不僅變相且及時地提供，被韓國排拒在外的韓國漢儒一個發聲與表現的舞台，同時也造就戰後台灣古典／文學史上一道特殊的景觀。

三、戰後台、韓漢詩壇的銜接：彭國棟、李瑄根與《亞洲詩壇》

確實，根據目前筆者所見之資料，邵毓麟與《亞洲詩壇》並無明確的淵源。但卻也惟有透過邵毓麟的外交經驗，我們才可以更具地體掌握國民黨政府與韓國之間，從「漢文外交」到倡議「禁用漢文」政局或生態轉折下，原先協助韓國獨立的「中國」，最後卻成為戰後韓國實踐後殖民時的阻礙之一的悖論及其張力，而得以更深刻地揭露戰後台灣、韓國漢詩交流之所以得以展開的根本原因。承此，讓我們將論述的視野，再轉向聚焦在文學與知識生產，作為兄弟之邦的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在戰後不惜各自用盡手段以維繫一線斯文或嘗試廢止漢字，而旁生歧異或裂縫時，兩造文學的互動與交涉究竟隨之分道揚鑣、殊途同歸，還是反而共同創造出新的互動機制與文學景觀？

話說從頭，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國隨後接管台灣，並在台灣

43 〈致讀者函〉，《中華藝苑》1卷1期（1955.02），頁1。

44 施懿琳，〈五〇年代台灣古典詩隊伍的重組與詩刊內容的變異——以《詩文之友》為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05），頁31。

實施「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政策，⁴⁵ 希望藉此重建台灣的「中國」歷史與文化記憶；而向來被視為賡續（中國）民族文化一線斯文的漢詩，也隨之被強化。⁴⁶ 由於漢詩「同文」的語言特質，在戰後實際上是不需要歷經「去日本化」的過程，⁴⁷ 因而產生戰後初期的漢詩與漢文人活躍於文壇的特殊現象。⁴⁸ 另一方面，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文武官紳，多是同時接受傳統漢儒教育與西方學術訓練的知識分子，相關的活動不僅更為頻繁，與之相應的漢詩社團與詩刊也隨之四起，而此盛況，一直要到1964年以「桂冠詩人」馳譽政界與文壇的黨國元老于右任逝世後，因「全國詩人典範的消失」，原先活躍的漢詩／人與相關活動雖仍持續，但較之於新文學而言，漢詩在文壇與文學史上的地位則「徹底失勢」。⁴⁹

大抵，我們已能藉此初步地看出，在國民黨政府同時掌控與介入台灣、韓國光復／獨立的後殖民脈絡下，引起國民黨政府與韓國政府齟齬的漢學或漢詩，在戰後台灣文壇卻有著逆向的成長與發展。那麼，我們又要如何思考台灣與韓國漢詩壇錯反的文學史意義？在此有必要先指出的是，戰前于右任在中國時已積極參與韓國獨立運動的推動。不僅如此，戰後對台灣政治與文學發展有過相當影響力的陳立夫、陳果夫、何應欽、張道藩乃至彭國棟等人，也都與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相關人士有過或深或淺的交往。也正是如此的歷史淵源與戰後兩國在「再中國化」與倡議「廢止漢字」政策的交錯下，提供了戰後台灣、韓國文學互動的空間與機制，而韓國／文學不同於他國文學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也已不言而喻。而《亞洲詩壇》不光是時勢下的產物，同時也開創了新文學時局。

45 詳參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17.08）。

46 同註44，頁29-61。

47 黃美娥，〈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223-270。

48 黃美娥，〈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光復元年」——以本省人士在台出版的數種雜誌為觀察對象〉，楊彥杰主編，《光復初期台灣的社會與文化》（中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09），頁270-297。

49 黃美娥，〈戰後台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台灣史研究》22卷4期（2015.12），頁127。

彭國棟無疑是我們透過《亞洲詩壇》揭示韓國漢詩／學被引介到台灣起點、路線與軌跡時，不可忽視的人物之一。彭國棟（1902-1988），字澹園，別號郁文，湖南茶陵人，國立山西大學九戰區幹訓團中訓團黨政班畢業。1949年來台以前，曾任國民黨華北黨務指導委員會秘書、軍事委員會處長與《陣中日報》社長等職。⁵⁰來台後，一方面擔綱中委會秘書處秘書要職外，主要從事教育與著述的工作，除了曾先後在中國文化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講學外，另在1959年發起串連亞洲15國詩人共同創立亞洲詩壇社，⁵¹並被推選為社長。《亞洲詩壇》在「聚亞洲詩人於一堂，宏令原豈弟於四海，亦足以促進種族之團結，發展東方之文化」的主張下，⁵²一方面敦聘于右任為名譽社長外，安岡正篤、阮瑋、李瑄根、今關天彭、黃有志、崔燦翊與賈景德等，即當時在亞洲各國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詩人或學者皆被延請為顧問，參與《亞洲詩壇》的創刊與亞洲部署。⁵³對於為何彭國棟或《亞洲詩壇》能邀集一時之選的漢學家與漢詩人加入《亞洲詩壇》的團隊或編務，有待更多的文獻、資料才能廓清，但藉此可以更進一步指出的是，前述論者在闡釋或評估《亞洲詩壇》將當時台灣與世界漢詩人，彼此輻射、輻輳的編輯策略時，多將來自各個國家、不同身分與歷史脈絡的漢詩人及其作品視為無差異的均質性存在，亦即是對詩刊中的詩人及其作品究竟是如何被編排、定位等編輯策略的視而不見，不僅是對《亞洲詩壇》背後所涉及的各種跨國政治角力的去脈絡化，同時也可能對《亞洲詩壇》意義與價值失去判準。

有鑑於此，讓我們將論述的視角再次拉回《亞洲詩壇》。1959年創刊於台北的《亞洲詩壇》，在創刊號中特別重刊申奎植《韓國魂》中的詩四首，這除了讓人一方面將此與先前邵毓麟受《韓國魂》鼓舞與感召而投身協助韓國獨立運動等

50 相關生平資料彙整自〈國防研究院（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125-001。〈彭國棟（彭郁文）〉，《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20000-3054。

51 本報訊，〈亞洲詩壇元旦誕生〉，《中央日報》，5版。

52 〈亞洲詩壇要旨〉，《亞洲詩壇》1卷1期，頁3。

53 同樣地，編輯委員如沈謨圭、杜為、李光群、金文顯、金彰顯、徐有守、陳梅谿，曾異三、曾舜虹、黃湄南、楊悅霖與楊國經等人，也分別來自或與日本、韓國、泰國、越南或菲律賓等地有關。

「援朝」的經歷相聯繫外，恐怕也不免要追問，為何以台灣為據點、以亞洲為訴求的《亞洲詩壇》，卻要召喚「韓國魂」呢？又為何在創刊號的「詩選」中，接連選錄時任韓國總統的李承晚〈海印寺〉等詩五首？對此，我們並不難窺知主事者有意引渡申奎植《韓國魂》中誓死抵抗的民族精神，一方面宣揚韓國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穩固亞洲各國反共的結盟勢力的企圖。在此立場下，徵引主張「廢止漢字」的李承晚的漢詩不無有諷刺或喊話的意味，但有韓國總統李承晚的漢詩助陣，不僅讓這份刊物的權威性得已被確立，也可以因此獲得另一種「官方」的認肯與背書。另外，尤其值得我們留心的是，在向各界徵稿的〈本刊徵詩啟示〉中，有一則是為慶祝蔣中正與李承晚分別連任台灣與韓國總統而進行徵詩：

中華民國總統 蔣介石先生，當選連任第三任總統。大韓民國大總領 李零南先生，當選連任第四任大統領。為東亞之救星，作中流之砥柱。萬邦同慶，六合騰歡。本刊以「元首明哉」為題，徵詩為頌，體裁不拘，於本年五月底集稿。採用者除在本刊發表外，並致送三名獎品。⁵⁴

徵詩啟示雖短，卻清楚地呈顯出較之於日本、香港、越南、泰國與菲律賓等國家而言，韓國是被放置在亞洲詩壇中心的景觀。這意外揭露一個令人玩味的現象：戰後仰賴國民黨政府才終於獲得獨立與國際承認的大韓民國，為何如今卻成為了與中華民國平起平坐，受萬邦認定的「東亞之救星」與「中流之砥柱」？換個方式說，為何彭國棟對韓國情有獨鍾？或韓國為何能在《亞洲詩壇》中博得此地位？

事實上，我們絕不能忽視時任韓國成均館大學校長的李瑄根在《亞洲詩壇》中的角色意義。1958年，在《亞洲詩壇》創刊以前，彭國棟曾受李瑄根之邀「蒞韓講學」，前後在韓停留三個月之久。⁵⁵ 彭國棟至成均館大學講學一事，備受當

54 〈本刊徵詩啟示〉，《亞洲詩壇》2卷5期（1960.04），頁3。

55 李瑄根，〈祝創刊〉，《亞洲詩壇》1卷1期，頁1。

時韓國漢學界重視，而彭國棟的學養與詩名更是「講席詩壇譽壇城」。⁵⁶ 韓國漢學界亦曾為此發起聯吟大會，韓國漢詩人除了熱忱地歡迎彭國棟這位詩界巨擘外，⁵⁷「國際同盟是舊緣」的兩國也在「詩歌可以增進兩國情感」的理念下展開文學外交的工作。⁵⁸ 韓國漢詩人也為這一段賦詩唱和的交遊，留下的精彩的見證。例如，金春東在〈謝澹園先生見過〉、〈送郁文大仁還台灣〉兩首贈別彭國棟的詩中，除了讚譽彭國棟「磊落澹園子，聲名滿世間」外，⁵⁹也相當感佩彭國棟對自己與韓國「遺我已秘笈，不換萬金頒」不求回報的付出。⁶⁰ 然而，無奈「大地墮赤燄，浮海止台灣」，不知下次何時能再見，而「唱罷驪歌淚不禁」。⁶¹ 此外，韓國還曾以〈送澹園歸國〉為題發起聯吟，參與的詩人分別是崔燦翊、李範昇、李明世、安寅植、吳鳳根、金台榮、趙楨、金龍培、王熙弼、金鍾國、林保光、林元植、任昌淳、柳幸佑、李家源、李壽源、梁大淵與金昌鎮。其中不乏韓國漢文學史上的大家，如著有《韓國漢文學史》並被譽為國學大師的李家源的作品：

茶陵詞伯遠東征，海上疇人空館迎。杏樹風高尋古緒，市樓酒煖話幽情。
 章章錦軸牛腰大，裊裊名花燕語清。集句無縫如我出，五車便腹孰能爭。

李家源在〈送澹園歸國〉中，在表露彭國棟將歸國的悵然、空虛之情時，同樣也對彭國棟的學識與人品有著高度的讚譽與評價。無獨有偶，洪震杓在〈贊呈彭先生〉的組詩中，也同樣表達了對於彭國棟的敬仰與「風雨神州失弟兄」的不捨之情，期盼「壯志核能甘佩犢，解兵詞客入韓京」。⁶² 彭國棟的講學經驗，無疑帶

56 梁大淵，〈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亞洲詩壇》1卷1期，頁8。

57 金昌鎮，〈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亞洲詩壇》1卷1期，頁8。

58 趙楨，〈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亞洲詩壇》1卷1期，頁8。

59 金春東，〈謝澹園先生見過〉，《亞洲詩壇》1卷1期，頁10。

60 同註59。

61 同註59。

62 李家源，〈送澹園歸國〉，《亞洲詩壇》1卷1期，頁12。

動且活絡了兩國漢詩界的交流。但重要的是，邀請彭國棟赴韓講學的李瑄根卻因此意識到，必須「加強推行研究工作，宣揚東方文化」的重要性與急迫性。⁶³而為能有效推展此工作，李瑄根更近一步且具體地提出「提議組織亞洲詩壇之計畫」的構想：

今年七月，國棟先生應敝校之邀請，蒞韓講學。韓中文化交流上極有裨益。國棟先生留韓三月，會詩有歡迎時，為發揚東方文化起見，曾提議組織亞洲詩壇之計畫，今已實現，並得付印之消息，感懷尤深。

近者雖謂西方的科學文明發達，即或能達到操人造衛星，由地球到月球旅行。但仍能維持長久歷史之東方文化與東方思想，乃至東方哲學，決不可廢除。據此任為加強推行研究工作，宣揚東方文化，而寄予世界文化向上，極為緊要。

團結亞洲反共文人！東方文化萬歲！

由李瑄根親自執筆的〈祝創刊〉篇幅不長，但卻為我們勾勒彭國棟赴成均館大學訪學，乃至於建議「組織亞洲詩壇」的原委與心境。毋庸諱言，團結亞洲反共勢力是所有考量、策略與行動的核心價值，但究竟要如何團結亞洲致力反共呢？對李瑄根而言，東方思想、文化是致勝的關鍵，因此，「決不可廢除」的東方文化，如何維繫並向外宣揚，成了最迫切的問題。而弔詭且諷刺的是，東方文化卻極可能在李承晚去漢化的政策下被阻撓與截斷。如此一來，李瑄根也只能將目光轉向韓國之外，而彭國棟或是其背後由中華民國所把持、象徵的東方文化之正統，也順利成章地成為了李瑄根重要資源與資本。而《亞洲詩壇》便是在李瑄根有意藉

63 李瑄根，〈祝創刊〉，《亞洲詩壇》1卷1期，頁1。

此維繫韓國漢學傳統，繼而擴展為延續、發揚「東方文化」意圖下的發明與創造。1958年回國後，彭國棟即按李瑄根的建議，於同年創立亞洲詩壇社，聘李瑄根為名譽社長，並在隔年刊行《亞洲詩壇》創刊號。而透過李瑄根獲聘名譽社長的聘書（圖1）、⁶⁴聘任信箋（圖2）⁶⁵或書信（圖3），⁶⁶我們不單再次確認李瑄根是率先發起組織亞洲詩壇社之先聲外，彭國棟對其之敬重與景仰亦表露無遺，而這也是為何在「亞洲詩壇」的景觀中，韓國總是被另眼相看的根本原因。

有必要一提的是，以筆者目前所見之資料來看，並無發現李瑄根所寫之作品。以此我們可以推想，李瑄根不以漢詩立足韓國漢詩壇或漢界，但卻透過自身在政治、教育界的人脈，繼而對台灣、韓國漢詩壇造成著深遠影響的文化人。也因此，儘管李瑄根在文學美學上雖無著墨，但其在台灣、韓國漢詩交流史上的重要性卻是毋庸置疑。更值得留心的是，李瑄根的影響力也絕也不僅止於漢詩與《亞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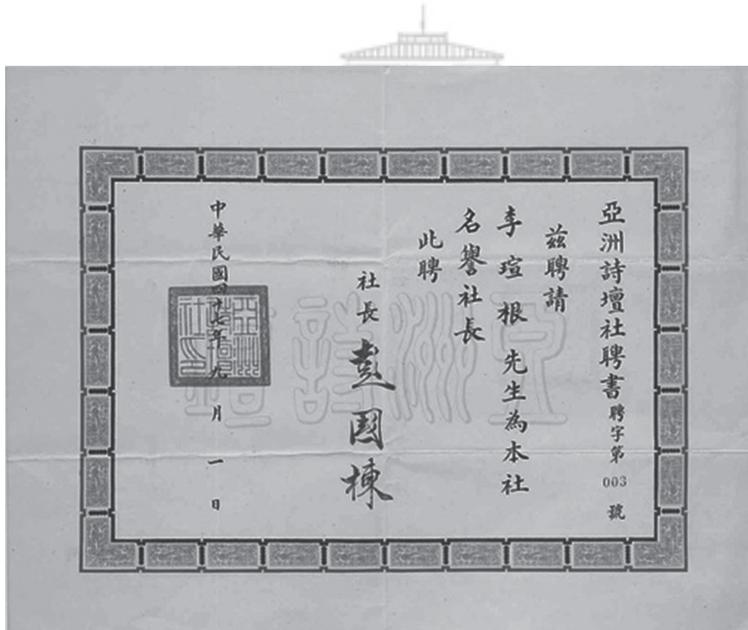


圖1 亞洲詩壇社聘書

64 「聘書 1 (1958)」，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藏，典藏號：ID 367。

65 「聘書 1_1 (1958)」，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藏，典藏號：ID 368。

66 「賦 1」，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藏，典藏號：ID 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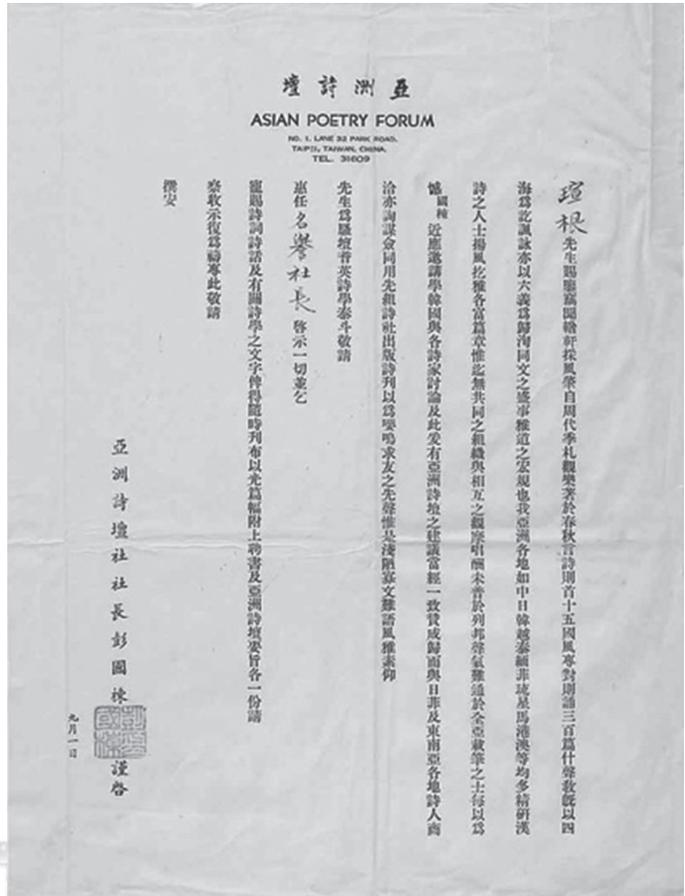


圖2 亞洲詩壇社致李瑄根的聘任信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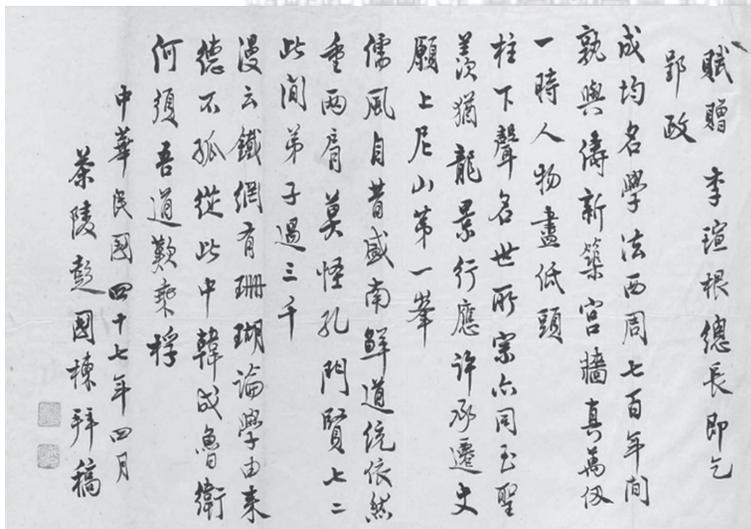


圖3 賦贈 李瑄根總長即乞郢政

壇》。1959年李瑄根另以成均館大學校長應邀訪台時，獲得時任總統的蔣中正的接見與招待，⁶⁷在這趟訪台的行程中，李瑄根也曾與台灣的漢詩界曾有接觸，如曾獲國家文藝獎的朱玖瑩，便有給李瑄根的贈詩：

客從韓國來，韓國吾好友。異地驚初見，知名亦已久。
 彭子講學歸，嘖嘖稱李某。崎嶇戎馬場，臨危不肯後。
 誰知萬夫敵，循循而善誘。三載席成均，一國尊祭酒。
 我緣唇齒誼，舉琬為君壽。須臾又別君，他時當奉手。

朱玖瑩在〈贈韓國成均館大學李瑄根總長〉中，⁶⁸除了表達個人對李瑄根的敬重，兩國的友好情誼外，我們也可以再次從「彭子講學歸，嘖嘖稱李某」的評價中，更具體地掌握到，彭國棟赴成均館大學講學一事，確實在當時漢詩／漢學界備受矚目，甚至被譽為「道協中韓比仲尼」。⁶⁹再者，我們也能藉此從知識傳播的角度來說明，彭國棟、李瑄根促成戰後台灣與韓國詩壇彼此銜承的角色位置。

走筆至此，我們終於可以回頭反問並回答，深受漢儒文化薰陶且自成一格的韓國，何以還要邀請彭國棟赴韓講學，要其為所謂的「東方文化」定調或背書？為何又要焦急地藉此呼籲亞洲各國「決不可廢除」東方文化？而「提議組織亞洲詩壇之計畫」為什麼不能在韓國被實現？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便是韓國在戰後後殖民的語境下，政府開始限縮、壓抑「漢字」的官方性與日常性。伴隨而來的自然是如李瑄根等漢學素養深厚的漢學家與一批為數可觀的「僑胞」，預感隨之喪失發言空間的焦慮心理。因此，其大聲疾呼東方文化「決不可廢」、「東方文化萬歲」的反應，正是對於韓國戰後後殖民以去帝國／中國的不安與抵抗。但另一方面，此時的台灣，卻恰恰正因為後殖民／再中國化的緣故，漢詩風潮方興未艾，

67 〈總統事略日記 48.09～48.10〉，《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101-00010-048。

68 朱玖瑩，〈贈韓國成均館大學李瑄根總長〉，《亞洲詩壇》1卷3期（1959.07），頁47。

69 杜為，〈讀彭公贈成均館李根源總長詩再賦奉承寄〉，《亞洲詩壇》1卷3期，頁17。

反而變向地提供韓國漢詩人發表與發聲的空間。而戰後台灣、韓國文學的交錯，即是在兩造悖反的後殖民立場下，別開生面地展開文學交流與網絡的銜接，而《亞洲詩壇》及其場域的生成，即是最佳的見證。

但，何謂交流？網絡的銜接又是如何形成？韓國與其他亞洲各國的差異又是什麼？對此，依筆者目前所見之《亞洲詩壇》為基礎，「詩選」所收錄的詩作共 685 首（同人同題計為一首），其中，「中國」（中華民國／台灣）詩人的作品共 258 首為最多，其次分別為日本 177 首、韓國 83 首。整體而言，韓國詩人的作品在數量上並沒有被特意地凸顯，反而還比日本來的少，但若轉從詩文的題材、內容來看，卻可以察覺韓國詩人在創作意圖、發言位置與他國迥異的特殊性。

在此聊以占據外國詩人／詩作最高比例的日本為例。盱衡《亞洲詩壇》中日本人的作品，諸如安岡正篤〈送歲迎春二律〉、今關天彭〈讀近代詩集題其卷末〉、岡田兼一〈春興〉、金子清超〈夏夕雨餘芸窓即事〉、鈴木虎雄〈謁博士王仁墓〉、芳原一男〈院庄謁作樂神社〉、足立慈〈自笑庵偶成〉、川村八郎〈夏山雨後〉、中村宏〈餞秋〉、笠井輝男〈季秋明月〉、小池重〈賀竹雨詩宗古稀〉、石塚參〈中秋觀月〉、高野源進〈落葉〉、栗本春〈曉起〉、橫河下枝〈春曉〉、土川瑞英〈早春尋梅花〉、神田喜一郎〈鬯齋藏書絕句第二卷〉或鈴木豹軒〈聖社雅集陶軒博士有賦似諸友作率攀瑤韻亦呈諸公〉等，我們可以清楚地指出其在選材與內容上，有意或不約而同地以自身的日常生活為景，並以抒懷、睹物或思人為「詩心」。儘管安岡正篤、神田喜一郎或鈴木豹軒等人詩藝不俗，但不免讓人質疑的是，專寫日本即景或藉此傷春悲秋之詩的現象，所展開的交流究竟是實質的抑或只是流於形式？而真正的問題反而是，這些為數可觀的詩作，又真能呼應《亞洲詩壇》「同宣聲教」以「促進種族之團結」，繼而同聲抵抗「赤禍橫流」、發揚「發展東方之文化」的願景嗎？

反觀韓國詩人及其詩作，其中雖同樣不乏李範昇〈早春雪窗〉、李明世〈牡丹峰〉一類借景抒情之詩。但金春東〈送郁文大仁還台灣〉、崔錫榮〈送澹園歸國〉、趙楨〈送澹園歸國〉、李元植〈送澹園歸國〉、柳宰佑〈送澹園歸國〉、

辛鎬烈〈彭子郁文浮海而東與漢城諸彥頗多唱酬聊賦長句以呈備作異日天涯比鄰之歡〉、金潤東〈辛夷塢奉別彭澹園詞伯〉、洪震杓〈贄呈彭先生〉、金彰顯〈奉贖澹園先生行○〉、金文顯〈奉呈澹園先生兼謝春暉集之惠〉，以及李範昇〈和中國大使館傅參事韻〉、金忠顯〈師範大學十二屆校慶〉，或鄭鎮象與出身中國的曾異三以〈仁者無敵〉為題的徵詩之作等，更是不容忽視。藉由這些詩作而更確實地掌握，在以漢詩作為反共結盟的策略，或戰後台灣、亞洲／韓國漢詩交流史上，彭國棟與《亞洲詩壇》無法被低估的重要性外，接著要指出的是，透過前述〈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同題聯作，與金春東〈謝澹園先生見過〉「大地墮落赤焰。浮海止台灣。曾吟春暉什，令人涕自漣。（中略）。遺我以秘笈，不換萬金頒」、⁷⁰洪震杓〈題亞洲詩壇社〉「隔海同聲氣。臨風愴歲年。亞壇多法力，赤鬼此中顛」，⁷¹或李範昇藉〈和中國大使館傅參事韻〉抒發自身與中國大使館傅參事之情誼，或鄭明甸在〈簡彭澹園社長〉中直陳，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風俗人情兄弟國，交流文物續芳緣」等詩，⁷²我們除了得以一窺韓國詩人對彭國棟溢於言表的孺慕之情、對亞洲詩壇／《亞洲詩壇》與「中國」文學／文化的嚮往外，同時也可以清楚地體察到，韓國詩人有意並嘗試透過漢詩，即「同文況是切葭莩」，⁷³以鞏固與「中國」之間「兄弟國」的情誼，並擴大為「亞洲自幸增好鄰」，以共同實踐「亞壇多法力，赤鬼此中顛」的反共志業。再者，鄭鎮象與曾異三在韓國開天節以〈仁者無敵〉為題徵詩的活動中，打敗數千詩友，分列總排第一與華人第一的表現，一方面說明二人詩冠群雄，⁷⁴以及當時與漢詩相關的活動十分躍外，另一方面其實也正體現中國、韓國「同宣聲教」共同抵禦「赤禍橫流」並

70 金春東，〈謝澹園先生見過〉，《亞洲詩壇》1卷1期，頁10。

71 洪震杓，〈題亞洲詩壇社〉，《亞洲詩壇》1卷3期，頁21。

72 鄭明甸，〈簡彭澹園社長〉，《亞洲詩壇》1卷3期，頁21。

73 金彰顯，〈寄澹園先生結成亞洲詩壇以編輯委員聘帖寄惠書此代謝〉，《亞洲詩壇》1卷2期（1959.04），頁15。

74 鄭鎮象，〈仁者無敵〉，《亞洲詩壇》2卷5期，頁32。曾異三，〈仁者無敵〉，《亞洲詩壇》2卷5期，頁32。

「發揚東方文化」的合作關係，而這所呈顯的正是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漢詩／人，如何在台灣／《亞洲詩壇》展開交流，又對兩造或亞洲漢詩活動與發展造成影響的現象與意義。

囿於本文的論述目的，在此先不論日本、韓國間南轅北轍的表述機制背後，可能涉及的歷史背景或政治命題，惟要以此說明的是，通過對兩造詩歌取向粗略比較後，我們或可以扼要地指出，較於日本內向、專注於描寫風景的書寫策略，韓國漢詩則有著較於外顯且強悍的反共意識。且值得關注的是，韓國除了積極想在戰後的「亞洲詩壇」博得發言權外，其也相當有意識地在召喚、重建其作為「東國」（東方之國）在亞洲的價值、地位與聲望，如張志淵在〈大東詩選序〉便清楚地揭示「東自有東詩，中自有中詩」的立場。是以，儘管韓國在如何傾慕中國或詩文傳統，甚至嘗言「東方文明幾千年，聞道中韓同祖先」，⁷⁵但諸如張志淵、申緯〈東人論詩絕句三十五首〉，或前述李瑄根倡議「東方文化、東方思想，乃至東方哲學，絕不可廢除」等以「東」自居，⁷⁶並嘗試建立自身詩教傳統的發言，我們更是不能忽略，並應該將之視為韓國漢詩／人在《亞洲詩壇》與「亞洲詩壇」上不可忽略的特質之一。而此美學特質的建構，正是在台灣、韓國漢詩壇彼此銜接下所形成的域外流域中，才被激發、形塑與呈顯。

總之，上述不單說明《亞洲詩壇》中的亞洲各國並非均質性的存在，藉《亞洲詩壇》建構、折射出的戰後台灣、韓國漢詩壇的銜接與交流模式的同時，也論證戰後台灣古典文學發展史上，台、韓漢詩壇從交涉到銜接一論述面向或議題的重要性與價值意義。

四、結語：從《亞洲詩壇》的交涉到亞洲詩壇的重構

上述從外交到文學，從邵毓麟、彭國棟到李瑄根的論述軌跡，儘管稍許迂迴，但也惟有藉此，我們才能指出在看似毫不相干的戰後歷程中，台灣、韓國漢

75 鄭明句，〈簡彭澹園社長〉，《亞洲詩壇》1卷3期，頁21。

76 申緯，〈東人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亞洲詩壇》1卷3期，頁33。

／文學間，實則蘊藏盤根錯節的歷史淵源與互動機制。意即，台灣在「光復」的語境下，帶有強烈象徵民族精神的「漢詩」，曾被大力提倡用以重構國族認同；但反觀過去同為東亞漢字文化圈一員的韓國，在「獨立」的自覺與政治需求下，李承晚卻走上「限縮」漢文正當性、合法性以推行國語的治理路線，在這一邊以漢文學重新召喚民族性，另一邊則從去漢化的方式來凝聚「韓國魂」的分歧道路下，表面看似背道而馳，但卻正是在提倡與壓抑的後殖民動態張力中，意外造就台灣、韓國文學錯置的生產與傳播空間，繼而推拓出兩國另類的戰「後」文學交流與歷史景觀，為戰後台灣、亞洲的漢詩的生產與美學開闢新的空間。但也必須特別指明的一點是，由於亞洲詩壇社並不附屬於任何官方機關或團體，這也使得《亞洲詩壇》編務與刊行經常難以為繼，在長達 20 年左右的發行期間，《亞洲詩壇》卻僅僅刊行 22 期，而就目前能見的零星幾期刊物中，一方面能窺知亞洲詩壇社務情況不盡理想外，《亞洲詩壇》各期的內容也因發行時間、地點的不連續而質量不均，因此，本文無意誇大《亞洲詩壇》對整體文學史發展的影響力，只欲由此指出彭國棟、李瑄根在戰後台灣、韓國文學交流史上承先啟後的先鋒性，以及從「漢詩」反思戰後台灣、韓國古典／文學互動與交流的可能與必要性。

大抵，本文透過上述之個案與刊物，率先為學界揭示李瑄根的角色意義及其對台灣文壇的影響，繼而初步提出討論台灣、韓國（漢）文學互動的新的詮釋框架，嘗試為相關研究另闢蹊徑。然而，更全盤、詳盡的考察，如漢詩在不同的情感／政治體之間，如何發揮、展現收編或抵抗、實踐或規避的思想批判與美學實踐？同文如何建置「東方文化」？另一方面，台灣國語運動與韓國國語醇化運動，對亞洲同文／漢文學帶來的影響是什麼？乃至於如何可能對亞洲文學秩序、情感結構造成變革等議題；實有助於台灣、韓國漢／文學研究的深化與拓展，然囿於篇幅與筆者才能，只能留待另文再加以詳論。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09）。
- 白永瑞，《橫觀東亞：從核心現場重思東亞歷史》（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03）。
- 白樂晴等著，白永瑞等編，《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0.11）。
- 石源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駐華代表團研究》（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05）。
- 李瑞騰總編輯，《2013 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12）。
- 沐濤、孫志科，《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中國》（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1）。
- 林大根、陳國偉主編，《台灣文學研究在韓國：歷史情感與東亞連帶》（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18.03）。
- 林孝庭，《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1949-1988》（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06）。
-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01）。
- 金秉祚，《獨立運動史略》（韓國서울特別市：亞細亞文化社，1974.10）。
- 金英今編著，《精編韓國文學史》（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07）。
- 俞昌均編，《國語의 醇化와 教育》（韓國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79.10）。
-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05）。
-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顯宗實錄·卷十八》（韓國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10）。
-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09）。
- 彭國棟，《中韓詩史》（台北：正中書局，1957.04）。
- 楊彥杰主編，《光復初期台灣的社會與文化》（中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09）。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17.08）。

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05）。

二、論文

（一）期刊

〈本刊徵詩啟示〉，《亞洲詩壇》2卷5期（1960.04），頁3。

〈亞洲詩壇要旨〉，《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3。

〈致讀者函〉，《中華藝苑》1卷1期（1955.02），頁1。

申緯，〈東人論詩絕句三十五首〉，《亞洲詩壇》1卷3期（1959.07），頁33。

朱玖瑩，〈贈韓國成均館大學李瑄根總長〉，《亞洲詩壇》1卷3期（1959.07），頁47。

吳養，〈寄呈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先生有序〉，《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9。

李知灝，〈戰後星馬地區漢詩人在台發表與社群交流：以《中華詩（藝）苑》（1955-1967）為研究中心〉，《台灣文學學報》31期（2017.12），頁63-98。

李家源，〈送澹園歸國〉，《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12。

李瑄根，〈祝創刊〉，《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1。

杜為，〈讀彭公贈成均館李根源總長詩再賦奉承寄〉，《亞洲詩壇》1卷3期（1959.07），頁17。

金良守，〈日帝時代 韓國斗 臺灣 作家의 二重言語文學〉，《중국어문논총》23期（2002.04），頁368-381。

——，〈戰後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以陳映真為個案〉，《國際中國學研究》6期（2003.06），頁309-321。

金昌鎮，〈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8。

金春東，〈謝澹園先生見過〉，《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10。

金彰顯，〈寄澹園先生結成亞洲詩壇以編輯委員聘帖寄惠書此代謝〉，《亞洲詩壇》1卷2期（1959.04），頁15。

洪震杓，〈題亞洲詩壇社〉，《亞洲詩壇》1卷3期（1959.07），頁21。

- 崔末順，〈反共文學的古典詮釋：五〇年代台灣文藝雜誌所反映的民族主義文藝論〉，《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3期（2016.12），頁138-169。
- 梁大淵，〈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8。
- 彭國棟，〈發刊辭〉，《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1。
- 曾異三，〈仁者無敵〉，《亞洲詩壇》2卷5期（1960.04），頁32。
- 越南孔學會，〈呈獻李承晚總統〉，《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17。
- 黃美娥，〈戰後台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台灣史研究》22卷4期（2015.12），頁123-166。
- ，〈聲音·文體·國體——戰後初期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1945-1949）〉，《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223-270。
- 趙楨，〈興天寺歡迎彭先生即席作〉，《亞洲詩壇》1卷1期（1959.01），頁8。
- 劉耀、陳文新，〈朝鮮使者筆下的台灣原住民賀壽朝覲活動述略〉，《東疆學刊》4期（2016.10），頁7-12。
- 鄭明句，〈簡彭澹園社長〉，《亞洲詩壇》1卷3期（1959.07），頁21。
- 鄭鎮象，〈仁者無敵〉，《亞洲詩壇》2卷5期（1960.04），頁32。
- 錢公來，〈亞洲詩壇創刊〉，《亞洲詩壇》1卷2期（1959.04），頁23。

（二）研討會論文

- 李知灝，〈戰後初期台日韓漢詩交流：以《亞洲詩壇》在台發刊時期為研究中心〉，「第五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創意應用研究所、國際文化創藝整合發展研究中心主辦，2019.11.22-23）。
- 金良守，〈韓台小說裡的殖民地經驗比較〉，「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06.05.27-28）。
- 金尚浩，〈楊逵與張赫宙普羅小說之比較研究——以〈送報伙〉與〈餓鬼道〉為例〉，「楊逵文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2000.04.19-20）。
- 施懿琳，〈台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台灣文藝叢誌》為對象〉，「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2001.12.08-09）。
- 許怡齡，〈17-18世紀朝鮮漢文文集裡的台灣論述〉，「第三屆西太平洋韓語教育與韓國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語文學系、韓國學研究中心主辦，2014.06.22-24）。

魏亦均，〈從「兩島」到「天下」：明鄭／文學視野下台灣、朝鮮的人際與文際關係〉，「東亞細亞學的現代意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韓國嶺南大學主辦，2019.08.12-13）。

——，〈從「華夷之爭」到「和漢變態」下的東亞景觀：以柳麟錫《毅菴集》為觀察場域〉，「17世紀到20世紀初的東亞交流和區域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2017.07.11-12）。

（三）學位論文

李知灝，〈戰後台灣古典詩書寫場域之變遷及其創作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姚蔓嬪，〈戰後台灣古典詩發展考述〉（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3）。

梁鈞筌，〈「中華共同體」的想像與跨國形構——以《中華詩苑》（1955-1967）為觀察對象〉（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

顧敏耀，〈台灣古典文學系譜的多元考掘與脈絡重構〉（桃園：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三、報紙文章

不著撰者，〈社說：漢字使用制限하라〉，《東亞日報》，1948.10.03，1版。

本報訊，〈亞洲詩壇元旦誕生〉，《中央日報》，1958.12.31，5版。

四、電子媒體

한국민족문화대백과사전편찬부（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編纂部），〈한국민족문화대백과사전：이선근〉（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全書：李瑄根）（來源：<http://encykorea.aks.ac.kr/Contents/Item/E0044685>，檢索日期：2022.01.14）。

五、檔案資料

〈國防研究院（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125-001。

〈彭國棟（彭郁文）〉，《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29-220000-3054。

「金九電蔣中正感謝中國相助返國並請邵毓麟同行」，〈革命文獻——蔣總統訪韓〉，《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20400-00034-085。

「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呈主席蔣中正為外交部呈來韓國新進黨代表金明濬籲請斡旋重開美蘇會議促成韓國獨立及李承晚經歷等文件」（1947.03.20），〈國際政治運動〉，《國民政府》，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1-060100-00001-017。

「聘書 1（1958）」，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藏，典藏號：ID 367。

「聘書 1_1（1958）」，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藏，典藏號：ID 368。

「蔣中正電魏道明請杜魯門明示美對朝鮮政策並告我仍持原商定主張」，〈籌筆——抗戰時期（五十七）〉，《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10300-00057-026。

「賦 1」，韓國學中央研究院（한국학중앙연구원）藏，典藏號：ID 464。

總統事略日記 48.09 ~ 48.10〉，《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110101-00010-048。

